

■ 考古新知

长沙首批秦简牍中现“大庶长”

罗小华 黄朴华

目前为止，长沙出土简牍约有20批。其中，墓葬出土简牍共计9批，其余均为古井出土。2013年9月，李均明曾在长沙五一广场长沙简牍学术研讨会上提出：“（长沙市）出土简牍数量全国第一；入藏数量全国第一；帛书数量全国第一；简帛年代跨度全国第一。”在此基础上，长沙简牍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数量最多（约10万枚），时间跨度最大（从战国到三国）。朝代序列最完整（战国、秦、西汉、东汉、三国）。

1951年11月，伍家岭203号西汉墓出土一批封检。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批科学发掘出土的简牍。1952年1月，五里牌406号楚墓出土一批竹简。这是第一批科学发掘出土的战国简。1996年7月至9月，走马楼街西南侧古井J22内出土一批三国孙吴纪年简牍，有字简牍约8万枚，是目前为止国内单批数量最多的简牍。自1997年5月至今，先后在九如斋、东牌楼、五一广场、尚德街等地的古井中出土多批东汉简牍，总数约计8000枚，全国最多。这些情况早已为学界所熟知。然而，长沙简牍在朝代序列上虽然已经涵盖了战国、西汉、东汉和三国等四个时期，却唯独没有秦。

2015年10月至11月，坡子街工地古井J5中出土一批秦代简牍，填补了长沙简牍在朝代序列上的缺环。根据简文“廿九年长沙阆”（060+038）和“卅三年九月月辛未”（014）的记载，该批秦简应属秦始皇二十九（前218年）和三十二年（前214年）之间。此时的六国已为秦国所统一。其中一枚简牍上写有“大庶长周举私”（116）。大庶长是秦军功爵中的第十八级，位秩较高。《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卿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皆秦制，以赏

功劳。”文献中有关于秦国大庶长的记载。《史记·秦本纪》：“宁公卒，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大庶长可以废立秦国君主，足见其权位之重。里耶秦简9—2301“不麦等以廿五年五月……大庶长责告五口幕候”，《里耶秦简牍校释》指出：“大庶，原释文未释。大庶长，秦军功爵第十八级。大庶长责，似即《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王翳之子，列侯通武侯‘王贲’。”王贲曾封爵大庶长。这也是不见于史书记载的重要文字。

此外，简牍中两次出现“苍梧”（030+007、019），应即秦朝苍梧郡。秦“苍梧郡”最早见于里耶秦简，何介钧提出：“里耶秦简中至少有数支提到苍梧郡。……最晚一支纪年为卅四年，简文甚长，其中有‘秦及苍梧为郡九岁，乃往’，简文表明‘苍梧’确实是郡名，而其建郡至卅四年已有九年，推算的结果应是建置始于始皇廿五年。”陈伟认为：“秦苍梧郡地适当其南部，这里便存在两种可能。其一，秦长沙郡境比先前推定的要小，其南部另有苍梧郡。其二，秦苍梧郡实即传世古书所载长沙郡，或者它们是同一处秦郡的前后名。在前已引述的里耶秦简J1:16:5正面，记有洞庭郡的三个邻郡：巴郡、南部、苍梧郡，却没有出现长沙郡。由此看来，上述第二种可能性要大一些。”这说明，秦朝时候的长沙，隶属苍梧郡。当时，长沙的行政建置在简牍中也是有所体

现的。关于上文所提到的“长沙阆”，赵培泉就提出：“应理解为‘长沙县的马阆’。”据此，则秦代的长沙，应为苍梧郡下辖的长沙县。秦代长沙县，最早见于里耶秦简。2019年，张春龙公布了简牍7-1和7-11的内容，前者记有“长沙言书到起”，后者记有“长沙布三道”和“以长沙印行”。张春龙认为，简牍中的“长沙”应是“秦县名”。赵培泉根据上述内容指出：“秦王政二十五年、秦始皇二十九年均设有长沙县，隶属苍梧郡。”从坡子街秦简的情况来看，秦苍梧郡下的长沙县，或有可能持续至三十三年。

关于秦苍梧郡和长沙县的记载，还见于长沙其他地方出土的秦简牍。2023年9月，朝阳巷J29古井中又出土一批秦简牍。这是长沙出土的第二批秦简牍。其中，有简牍明确记载着“卅一年五月壬子朔”“苍梧守”“长沙丞主官”等内容。“卅一年五月壬子朔”恰可对应秦始皇三十一年五月的朔日。其时间节点正好处于秦始皇二十九年和三十二年之间。也就是说，坡子街和朝阳巷古井中出土的两批秦简牍，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它们的出土地点又非常接近（相距不过百米）。“苍梧守”指的是秦朝苍梧郡的郡守。“长沙丞”指的是秦朝长沙县的县丞。这就更直截了当地指明了长沙县的行政建置，足以证明此前关于秦朝长沙县的推测不误。

综上所述，坡子街秦简牍的出现，不仅填补了长沙出土简牍朝代序列的缺环，也带来了关于长沙的更多信息。长沙出土秦朝简牍基本处于秦始皇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之间。当时的长沙为苍梧郡下辖的长沙县。随着长沙考古工作的有序推进，越来越多的简牍会被发现。这些简牍上所承载的文字，必定会给战国至三国时期长沙风貌的还原提供有力支撑。大庶长为何会出现在苍梧郡长沙县？这也是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作者单位：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 学术前沿

30 万年前的木器——云南甘棠箐遗址最新考古成果在线发表

高星 刘建辉 李波

2025年7月4日凌晨（北京时间），甘棠箐遗址研究团队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Science在线发表题为《中国西南甘棠箐遗址30万年前的木器》(300,000-year-old wooden tools from Gantangqing, southwest China)的研究论文，向国际学术界公布了一项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研究成果。

距今30万年的木器 如何被确定

该论文描述分析了在云南省江川县甘棠箐遗址发掘出土的35件保存完好的年代约为距今30万年的木器，与木器伴生的文化遗存包括大量石制品、骨角器、动物化石、植物遗存和用火遗迹。该遗址成组出现的痕迹清楚、特点鲜明的木器是目前东亚地区最早者，主要功能是对可食性植物根茎的挖掘，可以被称作“挖掘棒”（Digging tool）。同类工具在世界范围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非常罕见。遗址出土的石器多为小型刮削器，形态简单，加工痕迹精细，彰显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的鲜明特征。骨角器中包括几件用于加工石器的鹿角锤，在考古上被称为“软锤”，同类遗物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中也十分罕见。

甘棠箐遗址位于云南省江川县，坐落于抚仙湖南约5公里的一处自南向北流淌的小溪西侧的坡地上。该遗址发现于1984年，1989年做过首次考古发掘，出土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及木质材料。2014年至2015年和2018年至2019年两个野外考古学，该遗址被再次发掘，揭露面积64平方米，挖掘深度3.5~7米，出土丰富的石制品、动物化石、木质材料、植物种子和用火遗迹。本次发表的材料全部来自新近两次的考古发掘。

该遗址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木质材料和植物种子，这在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十分罕见。论证其年代的老性和埋藏条件及古人类生存的环境背景成为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通过地貌、地层和埋藏学的多指标分析，研究团队得出结论：甘棠箐遗址位置与环境特殊，人类活动时期形成的沉积物主要为河湖相堆积，是古抚仙湖湖岸河湖相沉积的结果。遗址在饱水、稳定的环境和快速埋藏的条件下保存了大量有机质材料。木器等有机物被埋藏在富含有机质的潮湿粘土地层中，缺氧环境造就了木器及其他有机质材料得天独厚的保存条件。

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显示该动物群具有古

老性，很多种类不属于现代动物，表明经常用于考古测年的碳十四方法不适合对该遗址的年龄测定。因此，光释光技术(OSL)成为该遗址最重要的测年方法。团队针对不同层位采集了23个沉积物样品进行测年，获得遗址的形成年代范围为距今20万至35万年的结论。此外，研究团队还对文化层中的一颗哺乳动物牙齿进行ESR/U系测年，获得的年龄为约28.8万年，与钾长石的光释光测年结果一致。根据ESR和OSL的测年结果，结合地层关系，通过贝叶斯分析为遗址建立了可靠的年龄框架。年代模型显示，含石器与木器的地层年代跨度为36万至30万年与29万至25万年之间，处在深海氧同位素的第9和第8阶段。

甘棠箐遗址出土近千件木质材料，其中35件被鉴定为人工加工的木器。如何确定遗址出土的一些木质材料是人类制作和使用的工具？为论证这些木器的人工属性及其特定功能，研究团队开展了痕迹分析、残留物分析和实验模拟等专项研究。其中19件标本保留明显的因削枝修型和削尖加工使用端而留下的刮削痕，17件尖端表面存在因使用而产生的磨光条痕和断裂破损迹象。这些痕迹出现在特定部位并具有方向性，是确凿的人类加工与使用的证据。从木器上提取到的一些植物的淀粉粒，进一步证明这些木器的主要功能是挖掘可食性的地下植物根茎。

研究价值与学术意义

甘棠箐遗址出土的数十件木器是一项世界级的重要考古发现。甘棠箐木器是目前东亚最早者，不仅填补了国内旧石器时代木制品研究的空白，同时对探讨木器的起源、加工技术、功能、演化发展过程具有重大意义。长期以来，学术界流传“东亚竹木器假说”，认为东亚地区古人类在旧石器时代高度依赖竹木器，那些相对简单的石器的主要功能是制作竹木器，后者承担人类生产生活的的主要任务。但由于植物材料易于降解，考古界苦于无法找到相关证据，该假说一直处于理论探讨阶段。甘棠箐成组木器的出土，证明东亚远古人类确实制作和使用过木器（目前尚未发现竹器），木器在先民的生产生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也拓宽了我们对早期木器加工技术和使用功能的了解，使“东亚竹木器假说”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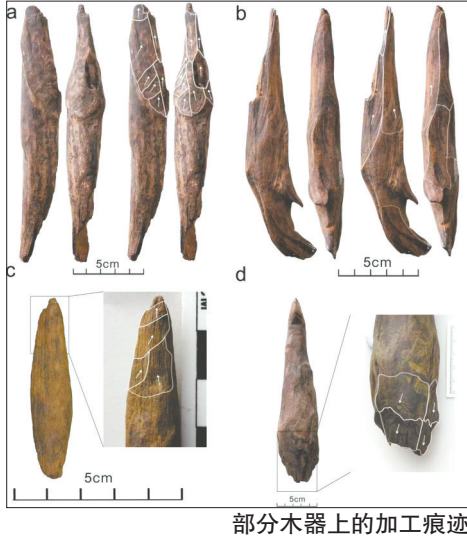
甘棠箐遗址出土的石器具有东亚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传统特点，但蕴含新的信息，对于重

新认识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传统的成因和东亚古人类特定的工具技术水平与认知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该遗址出土的石器中有些标本在刃口处出现细小勾称的修理痕迹，表明工具的制作者具有对石器使用部位细致加工的能力。与石器伴生的用于对石器精细加工的软锤材料是目前东亚最早者，在世界范围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中也难得一见。软锤的发现证明当时东亚的先民在石器技术上并不落后于西方的同期人群，甚至在某些方面有其特长和领先之处。这批石器材料还表明东亚旧石器时代的石器特点及其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优质原料缺失的制约与影响，也由此催生了对可用石材的精细加工和对木质材料的开发利用，表明东亚古人类在技术、文化和生存策略上与西方古人群有着不同的演化发展路径。

甘棠箐遗址首次提供了古人类运用木质工具挖掘利用地下植物根茎等食物资源的可靠证据，揭示了生活在热带、亚热带环境下的东南亚古人群独特的资源利用策略和适应生存方式。研究首次揭示了古人类对湖岸资源的认知能力与开发策略：通过携带特制木质挖掘棒有计划地前往湖滨地区，针对性地采集地下块茎类植物。该证据链不仅证实植物地下贮藏器官在早期人类食谱中的重要性，更揭示了亚热带环境中工具制造与植物资源开发的协同演化关系。

除此之外，以甘棠箐先民为代表的东亚古人类则更注重对石器刃口的修理，使其具备功能效用，而不很重视器物形态上的工整性和规范化，这应该是东亚古人类在面对相对劣质石器的原料时采用的简便务实的应对方式，也体现出旧石器时代人类技术与文化的多样性，揭示出旧石器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和东亚古人类因地制宜、灵活变通的适应生存策略。

甘棠箐遗址的学术团队由国内外多家科研单位不同学科的专业人员组成，开展了综合性、多学科、跨平台的合作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建辉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和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理学院李波教授为通讯作者。甘棠箐遗址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得到国家文物局、云南省文物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旅局、澄江市文旅局、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香港研究资助局等机构的支持。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提供了经费资助。



后石家河文化命名历程及现有名称的困境

浅议后石家河文化命名困境

在公元前三千纪后期至公元前两千纪前期的长江中游广泛存在着一类考古遗存，此类遗存普遍叠压于石家河文化地层之上。典型物质遗存以成人瓮棺葬和精美的随葬玉器、排房式的大型建筑和早期金属冶炼遗存，以及陶器叶脉纹饰、碗形器盖、三足杯、单把杯、高柄豆、长颈壶、刻槽盆、直领广肩罐、侧装高足鼎、浅腹圈足盆、小口广肩瓮、平口袋足鬲、陶塑小动物等为代表。分布范围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达洞庭平原和湘西、湘东山地，东至鄂赣交界的山地地带，西及鄂东峡江山地，北抵南阳盆地的汉江上游地区，与王湾三期文化、煤山文化、造律台文化等周邻考古学文化有密切关系。

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考古工作中便已发现此类遗存，但其识别和确认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则经历了较长的过程。1950至1980年代，此类遗存初步地被归入“湖北龙山文化”；1980至1990年代，随着材料积累和研究深入，“湖北龙山文化”正式被确认并定名为“石家河文化”，此类遗存仍被归入石家河文化，属“石家河文化晚期”，但学界已逐步认识到其有别于石家河文化的独特性。

20世纪末，有学者提出将此类文化遗存从石家河文化中剥离，独立为一支考古学文化。然而，由于材料限制和认识不足，学者们提出的多种命名方案都带有一定的权宜色彩，如石板巷子文化、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三房湾文化等，对其内涵的认识亦多有不同。

21世纪初，学界始以“后石家河文化”称呼之，21世纪10年代以后，以“肖家屋脊文化”称呼渐多。现在，“后石家河文化”和“肖家屋脊文化”这两种命名呈分庭抗礼之势，诸多文章常等价并称。尽管对于此类遗存的性质、内涵与分布范围，学界仍存较大争议，但在宽泛的条件下可大体将“后石家河文化”与“肖家屋脊文化”视作同等概念。

然而，以上称谓不论从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的角度，还是学术研究的实用性角度来说都不尽如人意。在很多情况下，“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石家河文化晚期”在不同文章，甚至同一篇文章的不同部分里混用，而“后石家河”除了用来表述一种考古学文化，在一些学者的表述中又常被用作时代的指称。

考古学文化作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概念和媒介，其命名混乱的问题会严重影响学术研究的开展。概念的指代不明与混淆，众多异名同质或者同名异质的概念混杂使用，不仅加大了写作者的表达难度，更使读者无所适从，甚至于影响考古学知识从学界向公众的传播，对学术研究和普及都造成了不利影响。

近年来，部分学者试图改变这种困境。如袁飞勇先生将其直接纳入“煤山文化”范畴；张海先生将这一阶段称为“后石家河”时代，并将所谓的“后石家河文化”拆分，将长江中游北部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乱石滩文化”，南部的命名为“肖家屋脊文化”；而魏继印先生则将其改称为“江汉地区后石家河时期文化”。但是，这些尝试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于此类遗存自身的特殊性，对其准确命名并不容易。

鉴于此，综合考量考古学文化命名法中“遗址最初发现地原则”和“典型遗址原则”，有必要将公元前三千纪后期至公元前两千纪前期的长江中游地区的这类遗存易名为“石家河上层文化”，以取代“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等命名。

易名为“石家河上层文化”的合理性

从学术发现史的角度看，此类遗存最早发现于石家河遗址。1954年配合石龙过水渠发掘的三房湾、贯平堰、石板冲、罗家柏岭等遗址点，均系石家河遗址中的主要地点。

从资料发表史的角度看，这批材料在1956年便已刊布初步简报，其中公开了此类遗存的典型遗物如玉凤、玉人头像、玉虎、玉鹰、青铜片、小陶塑、高柄豆、三足杯、尖底杯、澄滤器等，这也是石家河遗址最早被发现的遗存。

从典型遗址的角度看，此类遗存广泛分布在石家河遗址的各个地点早期文化层的最上层，直接叠压石家河文化遗存，是目前所知此类遗存中发掘资料最多，保存最完好，种类和遗存总量最典型丰富，沿用时间较长，分布面积最大的遗址，也是石家河上层文化的中心性遗址。

尽管关于此类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属性尚存争议，但在任何相关的研究中，石家河遗址和这类位于石家河遗址中最上层的遗存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无法回避的典型遗址和典型遗存，并被作为重点乃至中心资料进行分析。即便目前仍争论不休，但“石家河上层文化”遗存的典型性却已在实际操作中被学者们所公认。

在学术的自然发展下，“石家河文化”这一命名已经被学界所普遍接受，而石家河遗址早于石家河文化的各类遗存业已有“屈家岭文化”“油子岭文化”等通行名称，无须再行改易，仅有晚于石家河文化的这类遗存仍存命名争议，故以学界通行的“遗址地名+层位”的方式将其命名为“石家河上层文化”最为合适，兼顾了发现的第一性和遗址遗存的典型性。

那么，为何仍然要使用“石家河”这个涵盖范围较广的大地名来命名而不是“肖家屋脊”或“三房湾”等具体遗址点的小地名呢？以“后石家

■ 观点

兼论易名为『石家河上层文化』的合理性

宁逸风

在20世纪的探索中，由于发现发掘和研究认识手段的局限性，湖北天门石家河镇内约8平方公里内包含密集丰富遗存的区域，被认为是由多个小遗址组成的“石家河遗址群”。当时对于这些遗存性质认识尚不深入，将其较为孤立地看待，未能深入意识到这些遗存的内在联系。

进入21世纪，新发现已经可以确认石家河遗址是一个由众多功能区分明显的遗址点共同有机组成的大型遗址，而非遗址群。其城池面积达3.485平方公里，而大遗址的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遗址范围内基本连续分布着较为丰富的原生文化堆积，并且延续使用时间长达一、两千年之久，考古文化序列上没有缺环，各地点史前遗存的文化面貌高度一致。

它位于中央的谭家岭城为核心，四周从内向外呈环状分布着邓家湾、三房湾、大城垱、壕沟、印信台、严家山、土城、肖家屋脊、罗家柏岭等数十个性质不同、功能不同

但互有联系的遗存地点。这些地点并不是独立的遗址，而是石家河大遗址中各具功能的组成部分。既然只是大遗址的一个组成部分，单一地点的典型性显然不如作为整体的大遗址，不足以用来命名典型考古遗址，更不足以将这个命名上升为该考古学文化的典型代表。

因此，像这样横跨数平方公里的大遗址，其命名不宜采用如三房湾、肖家屋脊等具体遗址点的小地名，而应采用涵盖了这些具体遗址点的大地名“石家河”。“肖家屋脊文化”的命名者当初也考虑到了不同地点间遗存的性质和丰富程度，但限于时代局限性，仍将石家河遗址视作遗址群，未充分考虑其整体性。

此外，从词义的角度，“肖家屋脊文化”只体现了该类遗存与石家河文化的异质性，而没有体现与石家河文化的关联性与继承性。但是，尽管此类遗存中出现了较多新因素，但是亦明显地继承了石家河文化的部分典型因素。“石家河上层文化”从词义上既体现了与石家河文化的联系，又有所区别。

若从发现的早晚看，“石家河上层文化”的典型遗存远比石家河文化的典型遗存发现得要早，而且石家河遗址同样是该类遗存的中心典型性遗址，它们分布的范围高度重合，并且在诸多遗址上都早晚连续存在，石家河遗址在石家河上层文化阶段依然繁荣，何以较早的遗存用大地名“石家河”来命名，而较晚的遗存却用小地名“肖家屋脊”来命名？即便从最早发现地的角度讲，“肖家屋脊”也不是最早发现该类典型遗址的地点。因此，不论从考古学文化命名的“遗址最初发现地原则”还是“典型遗址原则”，“肖家屋脊文化”都不是最合适的命名。

如果说，“肖家屋脊文化”一名存在地名上的混淆，那么“后石家河文化”一名则存在时间上的混淆。“后石家河文化”的命名者显然已经考虑到其与石家河文化在时间上前后继替，在文化因素上既突变又继承的关系。但是，以“先”“前”“后”等时间性前缀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不规范性和模糊性已经被学界反复讨论。

“后石家河”更多的是一种历时性概念，是“石家河上层文化”认识初期的权宜之计，存在指代不清，范围模糊的问题，不宜作为考古学文化的命名。一些探索易名“后石家河文化”的学者已指出此节。

从词义上看，年代上晚于石家河文化的考古学文化，都可被称为后石家河文化。“后”的下限晚到何时，是难以明确的。前文已述，“后石家河”又常与“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晚期”“后石家河时期”混用，从而造成混乱。可用“后石家河”来描述石家河文化结束后的一个时间阶段，如“后石家河时代”将其作为年代学概念，而不具体指代某一种特定的考古学文化。

余论

综上所述，“石家河上层文化”这一易名在各个层面上，都能较好地体现和表述公元前三千纪后期至公元前两千纪前期的长江中游这批独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石家河”这一大地名所对应的遗址，既是该类遗存最初发现的遗址，材料最先刊布的遗址，也是遗存最典型、材料最丰富、面积最大，从各个层面上都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心遗址。采用镇级大地名“石家河”而不是具体遗址点“肖家屋脊”或“三房湾”等小地名，既更好地匹配遗址规模，又能体现与业已明确的“石家河文化”的关联，适合将遗址的名称上升为特定考古文化的名称，同时符合“最初发现地命名”和“典型遗址命名”这两大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

采用“上层”这一层位学概念而不是“后”这种时间性概念命名，可从名称上将该类考古学文化的内涵限制在以石家河遗址最上层广泛分布的这类遗存为代表的物质文化上，指向更加明确，不易混淆，有利于学术表达和学术普及，同时兼顾遗址内涵和最新研究进展，为相关问题的讨论提供更准确有效的概念工具。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人类学系考古专业硕士研究生）